

汉画像石文字相关问题论析

欧阳摩一 (南京博物院)

摘要：本文以出土及新发现的丰富的画像石文字题记资料，结合文献和相关研究成果，论析了墓地石祠堂和墓室名称、刻工、停厝及建造墓地石祠堂的时间等问题，廓清了画像石研究上的一些疑点讹误。

关键词：汉代；画像石文字；相关问题；论析

中图分类号：K87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1-0058-06

汉画像石文字主要分榜题和题记两大类，榜题是介绍具体画像内容的，而题记则是介绍祠主（墓主）情况的，为后世墓志之先声。画像石文字中透露出大量的汉代社会、经济、生活的信息，弥补了史载之不足，值得我们去探讨、研究。对画像石文字中榜题、题记的定义、内容、形式，堂、阙、墓造价等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论析；本文拟对墓地祠堂名称、墓室名称、画像石制作匠师、建筑祠堂时间等问题作探讨，阙误之处，敬祈方家学者教正。

一、关于墓地石祠堂的名称

汉代墓地的祠堂、墓阙与地下墓室尽管建筑形式不同，结构各异，但从性质上看，是一组互相关联的礼仪性丧葬建筑。墓上石祠堂集中分布于今山东西南部及皖北等地区。关于汉代墓上祠堂的种类（分土木结构与石结构两类）、汉代石结构祠堂类型（大致分四类，一、二类为单开间，三、四类为双开间，三、四类祠堂的祠主的身份、地位比一、二类的要高得多）、来源（源于西汉早期的庙、寝、斋宫等）、性质（同时具有庙、寝、斋室等功能的墓地祭祀性建筑）、分布等，信立祥先生论述甚为精当。另，酈道元在《水经注》中，将所见到的墓上祠堂分别称为“石祠”、“石室”、“石堂”和“石庙”。杨宽先生认为，这是由于酈道元没有搞清这些墓上建筑的性质，才导致叫法上的混乱。信先生认为，这

四种称呼是酈道元对不同形制的石祠堂而采用的不同名称。“石庙”应指那种后壁设有龛室的祠堂；其它三种称呼是指后壁不设龛室的祠堂^[1]。

但通过观察画像石刻文字可知，山东西南部的汉代（主要为东汉）墓地石祠堂的名称有“堂”、“食堂”、“石堂”、“石祠堂”、“食斋祠园”等。如：

东汉天凤三年（公元16年，以下除另注外，皆为公元纪年）的山东汶上路公食堂画像，画面刻车马出行，右刻题记：“□□元年二月廿日□□□□□公昆弟□天凤三年立食堂，路公治严氏春秋不踰”。微山两城桓氏食堂画像（139年）竖刻题记曰：“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桓彝终亡，二弟文山、叔山悲哀治此食堂，到六年正月廿五日毕成。自念悲痛，不受天祐，少终，有一子男伯志，年三岁，却到五年四月三日终，俱归皇泉，何时复会？慎勿相忘，传后世子孙令知之。”另，微山两城永建五年食堂画像（130年）、微山两城王氏食堂题记（136年）、山东永和四年题记（139年）、鱼台文叔阳食堂题记（144年）等皆作“食堂”。

延平元年（106年）的曲阜阳三老食堂题记：“延平元年十二月甲辰朔十四日，石堂毕成，时太岁在丙午……感切伤心，晨夜哭泣，恐身不全，朝半祠祭，随时进食□□……”

永兴二年（154年）的东阿蓼他君石祠堂石柱题记，三面刻画，一面题字。题额曰：“东郡

厥县东阿西乡常吉里芻他君石祠堂”。该题记中多次提及“石祠堂”、“堂”、“小堂”等。如孝子“克念父母之恩，思念忉怛悲楚之情，兄弟暴露在家，不辟晨夏，负土成墓，列种松柏，起立石祠堂，冀二亲魂零（灵）有所依止。岁腊拜贺，子孙懽（欢）喜，堂虽小，经日甚久，取石南山，更逾二年，这（迨）今成已……兄弟共处甚于亲在，财立小堂，示有子道，差于路食……”

永寿三年（157年）的宋山安国祠堂题记长达462字，为现存画像石题铭中最长的一篇。文中两次提及“堂”，记述造立祠堂经过及勿入堂中乱刻诸语：“……以其余财，造立此堂，募使名工……来入堂中，但观耳，无得涿（琢）画……”

另如邹城画像，画面刻一执斧门吏，其左刻：“食斋祠园”。祠堂之所以被称为“斋祠”或“食斋祠”，源于古代与宗庙祭祀活动有关的另一类建筑，即“斋戒”用的“斋宫”。“由于‘斋宫’与皇帝陵庙，‘斋室’与墓上祠堂是互相依存的祭祀性建筑，因而‘斋’、‘祠’连称，‘斋祠’或‘食斋祠’就成了墓上祠堂的别名。”^[2]

有意思的是，同处画像石第一分布区的江苏徐州一带，一般称地上墓地石祠堂为“石室”，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如：

江苏铜山永平四年（61年）题记：“建武十八年腊月子日□，永平四年正月为石室值五千泉上莒少郎所为，后子孙皆忌子”^[3]。铜山元和三年（86年）题记：“元和三年三月七日，三下（？）示大人子侯世子豪行，三年如礼，治冢石室直（值）□（钱？）万五千”^[4]。此二题记出于画像石墓中，但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馆长武利华先生认为，这些画像石原系祠堂画像石，后用以建墓葬，“石室”应指石祠堂^[5]。

另，东汉早期的铜山大庙镇单阙门吏画像右侧刻：“起石室立□值□万二千，孝经曰：□□宅作而□指之为家庙，以鬼□□食之”。铜山茅村门吏画像上也刻有“作石室”的题记。

而同处画像石第一分布区^[6]的皖北石祠堂画像石题记中，却不见“食堂”、“石堂”等名称（有待发现新的资料），而是直接记述墓主卒葬时间等内容。如：

建宁四年（171年）的宿县胡元壬祠堂位于墓冢南侧，其北壁画像正中，刻一小墓碑，碑额为“辟阳胡元壬□（之？）墓”。碑文曰：“建宁四年二月壬子…为冢墓石…父以九月乙巳母以六月…多子孙…上人马皆食大（太）仓…律令…禄慕高荣寿四敬，要（腰）带朱紫车……”熹平三年（174年）的宿县邓季星祠堂，同为东汉晚期的墓地祠堂，其中一画像分三层，第三层中心刻一墓碑，额题“邓掾冢墓”，碑文曰：“熹平三年十二月乙巳朔廿一日乙丑（？）新广里邓季星，年七十四，薄命蚤（早）离明世，长入幽冥……”。

此外，北京等地画像石文字中尚有“祠”或“显祠”等名称，但发现不多^[7]。

关于纪年墓地石祠堂

信立祥先生经统计后认为，目前发现有纪年的祠堂共17座，均发现于画像石第一分布区，15座在山东境内，2座发现于安徽宿县^[8]。但经核查资料，山东肥城栾镇村祠堂（建初八年，公元83年）和曲阜徐家村祠堂（延熹元年，公元158年），不是祠堂画像石，应为墓葬画像石^[9]。其实根据已发现的资料统计，有纪年的祠堂共发现21座。它们是：山东汶上路公祠堂（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江苏铜山永平四年祠堂（公元61年），山东肥城西里祠堂（东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铜山元和三年祠堂（公元86年），山东鱼台永元祠堂（永元八年，公元96年），滕县固城祠堂（永元十年），曲阳三老祠堂（延平元年，公元106年），滕县戴氏祠堂（永初七年，113年），枣庄延光三年祠堂（124年），微山两城永建五年祠堂（130年），微山两城王氏祠堂（永和元年，136年），微山两城永和二年祠堂（137年），微山两城永和四年桓氏祠堂（139年），山东永和四年王氏祠堂，鱼台文叔阳祠堂（建康元年，144年），嘉祥武梁祠堂（元嘉元年，151年），东阿芻他君祠堂（永兴二年，154年），嘉祥宋山安国祠堂（永寿三年，157年），嘉祥武荣祠堂（建宁元年，168年），安徽宿县胡元壬祠堂（建宁四年，171年），宿县邓季星祠堂（熹平三年，174年）。这21座纪年祠堂，年代从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至东汉晚期，主要分布于山东地区，少数发现于皖

北地区,为研究汉代墓地祠堂的发展及未刻题记的祠堂,提供了比较确切而实用的参考资料。

二、关于墓室名称

在画像石第一分布区,对墓室的称呼一般称为“墓”或“冢墓”,也有称“藏”、“郭(椁)藏”、“灵第”、“石室”等。如:

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山东曲阜“东安汉里”双石椁画像石墓中,出土一文字刻石,文曰:“河平三年八月丁酉汉里禹堧(墓)”。东阿茆他君石祠堂石柱题记(154年),三面刻画,一面刻字。题记曰:“……兄弟暴露在家,不辟晨夏,负土成墓,列种松柏,起立石祠堂,冀二亲魂零(灵)有所依止……”安徽宿县胡元壬祠堂画像(171年),该墓祠堂北壁画像正中,刻一小墓碑。碑额:“辟阳胡元壬□(之)墓”。碑文中也记述建宁四年二月“为冢墓石”。江苏泗阳樊氏画像石墓(东汉末或曹魏时期),计出24石,其中第6石正面刻“樊氏之墓”。山东蓬莱琴亭国李夫人墓门:“汉二十八将佐命功苗东藩琴亭国李夫人灵第之门。”诸城前凉台画像(东汉晚期)右上角刻:“汉故汉阳太守青州北海高密都乡安持里孙琮字威石之郭藏”。苍山元嘉元年题记(151年)也有“元嘉元年八月廿四日,立郭(椁)毕成,以送贵亲,魂零(灵)有知,怜(怜)哀子孙。治生兴政,寿皆万年。薄疎(疏)郭(椁)中,画观后当”等句。另,上述曲阜徐村藏堂题记中,称墓室为“藏堂”、“藏”。

在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第三分布区),对墓室的称呼则有“室宅”、“万岁室宅”、“万岁之宅”、“万年室”、“千万岁室宅”、“万年庐舍”、“吉宅”、“府舍”、“舍”、“室”等。如:

永元八年(公元96年)的绥德杨孟元墓,其立柱刻:“西河太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杨君孟元舍,永元八年三月廿一日作。”永元十年(公元98年)的绥德徐无令墓:“徐无令乐君永元十年造作万岁吉宅”。永元十二年(100年)的绥德王得元墓,墓室后壁正中刻:“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永元十五年(103年)的绥德四十里铺等处汉墓刻有:“永元十五年三

月十九日造作居”,“圆阳西乡榆里郭稚文万岁室宅”。永元十六年(104年)的绥德任孝孙墓:“永元十六年三月廿五甲申西河太守掾任孝孙之室”。延平元年(106年)的绥德四十里铺田文成墓:“西河太守掾圆阳榆里田文成万年室,延平元年十月十七日葬。”永初元年(107年)的米脂官庄牛文明墓:“永初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牛文明千万岁室长利子孙”。同为东汉中期的绥德黄家塔王君威墓:“使者持节护鸟桓校尉王君威府舍”。永和四年(139年)的米脂官庄牛季平墓:“永和四年九月十日癸酉河内山阳尉西河平周寿贵里牛季平造作千万岁室宅”。

晋西北的画像石承袭陕北画像石的风格,而墓室名称也延袭陕北的叫法,但也有直接称作“墓”的。如和平元年(150年)的离石左元异墓,墓内二石柱,一刻“和平元年西河中阳光里左元异造作万年庐舍”,一刻“使者持节中郎将莫府奏曹史西河左表字元异之墓”。而对石质棺椁,则径称“椁”。如离石曾出土二石椁,一刻“故雁门阴馆丞西河圆阳郭仲理之椁”,一刻“西河圆阳郭季妃之椁”。

四川、重庆地区(画像石第四分布区)的崖墓,多称墓室为“冢”,也有一些称墓室为“墓”或“神墓”的。如:

四川长宁七个洞画像崖墓群,计7个崖墓,其中1号墓外阙之左上方刻:“喜(熹)平元年十月廿□(五)□(日),作此冢宜子孙。”7号墓外鱼之图像下刻:“黄是(氏)作此冢,一门□究苦,知者谓我直(值),不知者怒。”乐山麻浩阳嘉三年崖墓(134年),有题记10处,如“王景冢王景冢王景冢”,“王景信父冢”,“邓景达□(冢)”等。乐山尹武孙墓,墓壁上刻蹶张,其下刻:“尹武孙莫(墓)”。乐山柿子湾延熹元年崖墓(158年),有题刻多处,如“延熹一年造,三年七月成”及“吴遂墓”、“吴升墓”等题刻。

另有少数称墓室为“藏”、“内”、“神门”和“延年石室”的。如:建初元年(76年)至元初五年(118年)四川乐山青神大芸坳76号墓:“建初元年十一月十日造”,“元初五年十一月廿七日杨得采藏”。阳嘉四年(135年)的重庆渝北龙王洞崖墓:“阳嘉四年三月造作延年

石室”。中平四年(187年)的成都金牛区汉墓：“中平四年十二月十三日造”，“梁离狐茂陵任君元升神门”。四川彭山杨子舆崖墓，其墓门框上刻有篆书铭文：“蓝田令杨子舆所处内”。

在河南南阳等地(画像石第二分布区)，对墓室的直接称呼发现不多。

南阳画像石文字题记中有称墓室为“墓”的，但不多见，如南阳市东关李相公庄出土“许阿瞿墓志”。有的墓则把墓室各部分按照人间居所名称来命名。如唐河县新店郁平大尹画像石墓(新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从该墓前门至后主室，刻有8处题记，内容包括墓主人姓氏、官职、纪年、墓室建筑名称及方向等。如：“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柒日癸巳葬，千岁不发”；“郁平大尹冯君孺久车库”；“郁平大尹冯君孺久中大门”；“郁平大尹冯君孺久藏阁(阁)”等。

对墓室的不同称呼，是与各地区经济、文化和丧葬礼制、丧葬建筑发展程度紧密相关的。第一、四分布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且墓阙、墓地祠堂和墓室三者配套建立，组成一套互相关联的完整的丧葬建筑，墓室的定位比较准确，所以一般径称墓室为“墓”或“冢墓”。而第二、三分布区墓上不建有阙和祠堂(第三区的经济、文化水平还逊于其他地区)，堂、室均建于地下，把地上人间的房舍及生活方式照搬到地下世界，所以就把墓室称为“室”、“宅”、“舍”或其他具体居所名称，反映出汉代人“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

在少数题记中把墓室与“堂”合称。

如汉安元年(142年)的江苏泗水南陈庄汉墓，该墓中室与前室之间门楣上刻画像，其右侧刻：“汉安元年泰岁在午。使师弟伯天□作寿石堂室。……”延熹元年(158年)的山东曲阜徐村画像石墓题记：“□(延)熹元年十月三日，始作此藏堂……即□□(十月)廿日成此田买奴，以十一月七日葬妇此藏中。……”此二题记将“堂室”、“藏堂”连称。堂者，自然是祠堂；室、藏者，墓室也。汉代较大型的画像石墓，一般都有两个堂。一个“堂”是地下墓室中的中室或前室，此为仿人间前朝后寝、前堂后室而建；另一个“堂”则是墓地祠堂。前者是墓主在地下

世界待客、办公之所，后者是联系现实人间世界和地下鬼魂世界的纽带，是后世子孙祭祀祠主(墓主)之所。上述泗水南陈庄、曲阜徐村二题记，皆出于墓室之中；南陈庄汉墓尽管形制不大，但“五室俱全”^[10]，堂室皆有，可知此二题记中所谓“堂室”、“藏堂”(关于“藏堂”本文末还有论述)，皆指地下墓室，此处之“堂”应指墓室的中、前室。另，山东苍山元嘉元年(151年)画像石墓石刻题记中，也“将墓室前室直接称为‘堂’”^[11]。

这样的题记也出现于陕北等地。如绥德张文卿墓(104年)中刻铭为：“西河圖阳张文卿以永元十六年十月造万岁堂。”其下有圆笔变体字“张□室”。此处“堂”、“室”，显然也是指地下墓室中的前堂后室。

三、关于刻工

据《石刻考工录》，史载汉时刊刻碑文、经文的石工良匠有宋高、邯郸公修、苏张、陈兴、王明、刘武良、刘盛、卫改等；另，建和元年(147年)石工孟孚、武卯造武氏祠石阙，孙宗造石狮子^[12]。但据山东嘉祥武氏祠石阙铭文，应为孟孚、李弟卯等石工造武氏祠石阙。

除此而外，在汉画像石上还留下了不少石刻匠师、画师的姓名，为我们今天研究汉代石刻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如：嘉祥宋山安国祠堂题记(157年)：“……以其余财，造立此堂，募使名工：高平王叔、王坚、江湖、恋(栾)石，连车采石县西南小山阳山，涿(琢)病(砺)摩(磨)治，规矩(矩)施张……”高平为东汉县名，在嘉祥东南，离嘉祥不远。

芑他君石祠堂石柱题记(154年)：“永兴二年七月戊辰朔廿七日甲午……列种松柏，起立石祠堂，冀二亲魂零(灵)有所依止。岁腊拜贺，子孙懽(欢)喜，堂虽小，经日甚久，取石南山，更逾二年，这(迨)今成已。使师操(义)，山阳蝦(瑕)丘荣保，画师高平代盛、邵强生等十余人。段(价)钱二万五千……”

微山两城王氏食堂画像题记(136年)：“永和元年，太岁在丙子，十二月廿六日，□□□王成□立食堂，直钱五千。时石工严申(？)□□□元住食堂。”此题记杨建东先生释为

……”嵩山少室阙铭：“……於鼓林芷绵日月，而三月三日，郡阳城县兴治神道。君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阴林，户曹史夏效，监庙掾辛述，长西河圉阳冯宝，丞汉阳冀祕俊，廷掾赵穆，户曹史张诗，将作掾严寿，庙佐向孟、赵始”。少室阙主持建阙工程官吏的姓名与开母阙铭大同小异，其制作年代可能很接近。

从以上资料可见：（一）东汉，特别是东汉中期，山东是当时画像石最为繁兴之地，也是石工众多、名匠辈出之地，且以高平、任城等地（皆在嘉祥附近）为中心，并因名气大而从山东走向周边地区；（二）四川、重庆等地的画像崖墓中“某某作冢”等题名，多为墓主亲属姓名，表明其出资为亲属建墓，这与山东等地的行文内容及形式有异；（三）河南等地所造石阙，因系官造性质，而刻上主持及监工的官吏名和匠师名；（四）陕西、山西等地的画像石上，一般不见匠师名姓；（五）画像石上所载石刻匠师、画师及主持、监工、承办官吏名，为我们了解汉代画像石刻及建筑情况，增补《石刻考工录》提供了新的资料。

（注：本文为国家文博系统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汉画像石上文字的研究》系列论文之一，该课题编号为2001050。文中画像石文字出处，见近年来已发表之考古报告、图录、论著及笔者收集之资料，笔者已汇编成《汉画像石文字的发现和整理》、《汉画像石文字年表》二文，待刊，兹不一一注明。）

注释：

[1][2][11]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74-80页、67-74页、82-83页、323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3][17] 王黎林、李银德《徐州发现东汉画像石》，《文物》1996年第4期。

[4] 李银德《徐州发现东汉元和三年画像石》，《文物》1990年第9期。

[5] 见武利华先生提供给笔者的资料。

[6] 信立祥先生把画像石分布区分为五个区，第一区为山东及周边的苏北、皖北、豫东，第二区为河南南阳及鄂北，第三区为陕北、晋西北，第四区为四川、重庆、滇北，第五区为河南洛阳等地。此分区法受到画像石界广泛认同。

[7] 信立祥先生所著《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四章中，将北京幽州书佐秦君墓阙题记中一句，释为“欲广祠庙，尚无余日”，认为汉代人除以“食堂”等称呼墓

地祠堂，还以“祠庙”或“庙祠”称之。但笔者核对该阙题记图片后，认为此四字为“欲厚显祠”，拙文《画像石文字考释》中略作论述。

[8]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82-83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曲阜徐家村“藏堂”为墓室，信立祥先生将其列于墓地祠堂，不妥。

[9] 王思礼《山东肥城汉画像石墓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159，齐鲁书社1982年。

[10] 泗水县文管所《山东泗水南陈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95年第5期。

[12] 曹毅辑《石刻考工录》1-2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13] 杨建东《微山两城“永和元年”石祠堂画像》，张从军等《汉画像石》346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

[14]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354-355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15] 《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二册图39、图40，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文博简讯

梓潼出土摇钱树修复成功

梓潼摇钱树1970年出土于四川省梓潼县宏仁羊头山。树干断面为椭圆形，长径2.6厘米，短径1.9厘米，树干壁厚0.2厘米，树叶厚0.1厘米，树干共分6段，每段高为21厘米，树干中央有一圆雕人像，高9.8厘米，宽4厘米。人像两侧有树叶成的背屏，背屏四周有芒刺，中央人像右侧有一侧身人像，面向中央人像单腿下跪，中央人像左侧有一立马，双耳竖立面向中央人像。壁形与龙形树叶，通高18厘米，通宽20厘米，壁形左侧为挂钩，右侧为龙，龙身弯曲，口含方枚，方枚中空。枝叶为树枝形，其中长满了铜钱，钱之方孔不太规范，枝叶右端为一展翅凤鸟，树枝四周有芒刺。梓潼摇钱树干和树枝共计30余件，比较完整的有6件，其余都残缺不全，壁形与龙形树叶20件，比较完整有2件，其余残缺不全，凤鸟钱形树叶14件，比较完整有2件，其余残缺不全，2009年11月底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完成修复。修复后的摇钱树高2.1米（包括树座，树座高0.55米），宽0.8米，是目前省内出土大型汉代摇钱树。（封三）